

## 清华园往事

○俞润民

1928年，父亲俞平伯应聘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授。那时我家住在北京东城，父亲去清华教课就要至青年会乘学校的班车，很不方便，就带着我们于1930年秋迁至清华南院（现照澜院）七号宿舍。清华南院是由十几所小住宅围成的，中间空地是个网球场，环境很清静，和城内的四合院房屋大不相同。当时我只八岁，它给我的印象很深。

初至清华园时，我上小学三年级，我的学校名“成志小学”，是清华大学为学校教职员的子女设立的。学校就在清华园内，小学校很小，学生也不超过约二三十人，所以学校就将一、二年级，三、四年级和五、六年级分成三个班，每位老师同时教两个年级。这办法也很不错，因学校学生少，所以不论是哪个年级的学生，互相都认识，也较熟悉。当初上过成志小学的同学，现在有不少已成为世界上的知名学者了，也许就是因此，成志小学虽已没有学生了，但校舍仍保持原貌。

我上小学年代是1930—1934年，距今已有六十多年了，许多往事已经无法回忆，可是却有一些小事至今仍记忆犹新。儿时往事本来就值得回忆，清华校园的童年往事更令人珍惜。

我每天上学都要先经过一条小河，河并不大，但终年流水潺潺，每当春天，河岸杨柳发芽，景色很好，我那时不会写诗，

而父亲却曾写有一诗，题名《清华早春》，诗云：

余寒疏雪杏花丛，三月燕郊尚有风。

随意明眸芳草绿，春痕一点小桥东。

这首诗就是描写南院门前小河的景色。

经过小桥，就是清华园大门了，再西行不远就是成志小学。记得我上小学时，功课只是平平，到了六年级将毕业时，我们班上只有两人，我名列第二，这真是和世间流传的小笑话雷同了。

上图画课，有一次老师出的画题是一首唐诗“松下问童子……”那时我哪里能画这样意境深远的画呢！见题后茫然不知所措，可是真有同学按诗意就画出一张很好的画来，不知为何，此事我记得很清楚。

在班上，有一次老师让我上台讲故事，这是我第一次在台上向大家讲，心里非常紧张。那天父亲也来听，他在日记中有一小段记载：“上午有课，下午至成志小学看润民讲故事，神气尚好，只是说得太快。”可见我当时紧张的情态。

小学的毕业典礼，大家要唱歌送别。这首歌词和曲调，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其歌词是：“榴红吐艳，柳碧垂丝，现诸君毕业正当时，看那些花儿草儿，也为人伤心别离……”歌子委婉动听，至今难忘。这样就结束了我的小学生活。

清华大学只附设小学，没有初中，所以我就在燕大附属初中上学，由清华园来

此上学的还有熊秉明，我们一同在初中同学三年，每天骑自行车同路往返。下学后，主要活动仍是在清华园内。自日本侵入我国东北三省、九一八事变以后，清华大学抗日气氛很浓，在大礼堂时常有抗日话剧演出。我最爱看曹禺先生（他当时是清华的学生，名万家宝）演的话剧，至今仍留有印象。

我父亲那时也是充满爱国忧国之心，他说：“今日之事，人人皆当毅然以救国自任。”他还写了一篇《贡献给今天的青年》刊登在《中学生》第二十一期。他号召青年要“信自己的力量；信中国是可救，是应救的；信我们可以救中国，我们是应当救中国的”。

父亲在清华大学任教时，讲授《清真词》和“词”习作课，此外还讲授小说和戏曲。他认为词、曲有相同之处，它们都是乐府的支流，与昆曲也有联系，所以他就联合一些同好者，研究昆曲。参加者很多都是清华名人，如朱自清先生夫妇、浦江清先生、汪健君先生和谭季龙先生等。也有清华中文系学生华粹深等多人。后渐渐就组成了曲社，因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华北势力很大，他们就将曲社定名“谷音社”。是取“空谷足音”之意，也是针对当时的时局而言。“谷音社”社员由原来十余人发展到三十多人，还在清华工字厅举行过几次曲集。在清华校园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父亲住在清华南院时和陈寅恪、朱自清、浦江清、杨振声等教授经常来往。朱自清先生曾住在南院的单身宿舍，距我家很近，因系单身一人，饭食不方便，父亲就请朱自清先生每天来我家共餐，朱先生一定要付伙食费，父亲当然不肯收，朱

自清先生一定要付，最后只好收下，而暗中却又把这钱全部用在给朱先生添加伙食上。朱先生后来渐渐地察觉了丰盛的饭菜是专门为他做的。饭费本是一件小事，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抗战以后，父亲因亲老而留在北京，他坚不与日伪政权合作，高风亮节为世人所重。朱自清先生自昆明寄《怀平伯》三首七律，是很有名的，久为人传诵。其中第二首有句云：“西郭移居邻有德，南国共食水相忘。”就是说在南院与我家共饭的事。第三首有句云“庭空三径掩莓苔”和“引领朔风知劲草”，都是对我父亲的鼓励和关怀。

1935年清华大学在南院宿舍之南，新建了一片宿舍，称之为新南院（现新林院）。房屋较好，屋前都有一大片空地，用矮松树围起。我家也就迁至新南院四号。母亲喜爱园艺，她在门前种了玫瑰和月季花，前面空地就种了一大片花生。后院则种了草莓。还未等太熟我就常去摘食。那时我正读初中，闲暇之时，常骑自行车在清华园内各处游玩。我喜欢清华园的幽雅宁静。

1936年，我国首次参加奥运会，由清华大学马约翰教授任主教练。集训队就设在清华大学。在操场上常常有运动员练习，我有空闲就要去观看。记得撑竿跳名将姓符，只有他一人在柏林奥运会上得到决赛权，虽然未能进入前三名，但也算是为国增光了，因为这是我国参加奥运会的开始。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京，清华大学南迁。以后抗战胜利，清华大学又迁回来。但我也没有机会再去。直至1950年，那时我已大学毕业在天津工作，新婚，偕妻陈煦回北京省亲，同去清华园访旧。行至清华园大门，门卫老校工还

## □ 荷花池

认识我，看见我，他就说：“你不是俞大头吗？”童年时的外号为新婚之妻所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是，确又使我感到非常亲切，似乎又回到了我的童年。我们还一同去看成志小学，虽然已无学生，但校舍仍在，连外观都没有改变，“成志小学”四个字仍然在门上。我给陈煦讲一些

往事。小学旁的小土山是我昔年常去玩要的地方。我们又去看南院和新南院旧居。可惜经过日本人八年的占领，已不是当年的气氛了。

我在清华园内共住七年，时间不算长，但童年往事至今仍留下美好印象。

（原载光明网 2014 年 7 月 24 日）

## 通达随和——读任公家书

○孙 尧（1994 级土木）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1922 年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 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现代人手写书信的很少了。取而代之的多是电子邮件、电话、手机短信。然而，



梁启超与儿子梁思永（右）、梁思达（左）  
摄于 1920 年代

我最钟情于书面的信函，尤其是亲情的家书，字里行间，栩栩如生。如今回过头来看任公家书，心里更得许多的启迪。

作为文化人和改革家，任公不仅局限于社会的活动，还以其独特的方式教育膝下子女，使之分别成就各自的人生观和事业。其九个子女个个成才，一家中走出三位国家级院士。

任公极为重视子女的教育，他一生中给孩子们写了大量的书信。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反复强调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并且一再告诫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正因于此，才有了任公的大公子梁思成先生在清华读书时的优异成绩和广泛的业余爱好。后来梁思成先生赴美留学期间，任公又告诉儿子要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学科稍为多用点工夫。任公以自己的经验和感触说到，“所学太专门”会把“生活也弄成过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任公不仅仅是在求学、择业上关心孩